

## 學術與政治之間——鄭欽仁教授\*

吳密察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 摘要

鄭欽仁教授由一個專注於中國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學者，轉而積極地關懷政治是 1969 年 8 月以哈燕社獎學金赴日進修之後的事。鄭教授之赴日進修手續，獲得原來台大歷史研究所學長張國興之幫助，張國興應該對鄭教授的政治參與和以後的政治行動，有非常大的影響。張國興加入日本的台獨聯盟。回國後的鄭教授在教學、研究之外，他還參與了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在鄭教授回國後參與的民主化運動過程中，與康寧祥、陳永興、李永熾之間的結識和合作，最值得注意。後來鄭教授主張應該創造一個平台，讓這些已經聚合在一起的有志者得以繼續發揮力量，於是建議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雜誌。1988 年，康寧祥集資成立「財團法人現代學術基金會」，鄭教授擔任基金會董事長。1989 年，康寧祥創辦《首都早報》，鄭教授擔任該報總主筆。1990 年 6 月，鄭教授以《首都早報》總主筆出席李登輝總統就任之後的「國是會議」，提供了不少灣民主化的建言。

**關鍵詞：**鄭欽仁，日本台獨聯盟，八十年代，首都早報

---

\* 薛化元、潘光哲、劉季倫教授(2004)曾訪談鄭欽仁教授出版《鄭欽仁先生訪談錄》，其中鄭欽仁教授對其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之過程，與其對台灣民主化運動的諸多人物、事件，也多有敘述與評論，因此本文盡量避免重複。另，本文寫作時，亦引述此訪談頗多，但為避繁瑣，多不逐一註明。

## 壹、書香公益世家之少爺

鄭欽仁教授，1936年出生於新竹的書香世家。父親鄭肇基（伯端，1885-1937），祖父鄭拱辰（1860-1923），曾祖父鄭如蘭（香谷，1835-1911），高祖父鄭用錦。鄭用錦之二兄便是有「開台黃甲」之譽的鄭用錫（1788-1858）。

新竹鄭家，自19世紀初年至20世紀中葉一直是新竹地區最有社會資望的家族。鄭家在新竹發展之起始是鄭崇和（1756-1827）。關於鄭崇和，連雅堂（1920）《臺灣通史》列入〈鄉賢列傳〉，對其行誼的記述為：

鄭崇和，字其德，號怡庵，金門人。年十九〔1775〕來臺，課讀於淡水廳竹塹，遂家焉。淡為新闢之地，民少讀書，崇和勸勵之，富家子弟多就學，奉師厚，故修脯亦豐。

嘉慶十年〔1805〕，蔡牽犯淡水，土匪竊發，崇和適在後瓏，奉檄募鄉勇防守。事平，當道嘉之。

淡屬閩粵雜處，分類械鬥，歷年不息。崇和又奉檄彈壓，召兩造父老，力陳利害，仇始解。

竹塹多山野，土番輒出殺人，歲且數十。崇和乃集壯丁，據形勢，鳩資設隘，以保衛行人，樵蘇便之。

二十年〔1815〕，歲饑，發粟平糶，而家亦富矣。

當是時竹人士議建文廟，崇和慨然出巨款，命次子用錫董工。廟成，行釋菜禮。

竹塹文風之盛始於此。崇和好宋儒書，尤守紫陽家訓，及門之士多達材。道光七年〔1827〕卒，年七十有二。九年〔1829〕，邑人請祀鄉賢祠，十二年〔1832〕詔可。次子用錫，亦有名。

也就是說，鄭崇和來到台灣之後不久，便已經成為新竹地區名士，

不但是個教讀的塾師，而且也已經累積了相當家產，並在防備海盜蔡牽或設隘「防番」、排解地方上的分類械鬥都盡了相當力量，對於新竹建城與倡建新竹文也多有貢獻（張炎憲，1986）。

鄭崇和有子四人，分別為文理、文衍（用錫）、文順（用錦）、文靜（用甜）。其中，次子文衍（用錫）於 1810 年入學，1818 年中學，1823 年高中進士，人稱「開台黃甲」；四子文靜（用甜），1844 年恩貢；三子文順（用錦），亦為生員。

鄭如蘭（1835-1911），連雅堂（1920）《台灣通史》將之入〈孝義列傳〉，記云：

鄭如蘭，字香谷，新竹水田莊人。父用錦，附生，早卒，母張氏育之。

如蘭讀書知大義，事親孝。張氏有疾，延醫診視，方藥必證以醫書，嘗而後進。沒時喪葬盡禮。同治五年，奉旨旌表節孝，如蘭建坊以志。

如蘭家固裕，又儉樸；然遇地方義舉，則出而義辦。家畜童婢，遇及笄者必遣嫁之，故人多其德。

光緒十五年〔1889〕，以辦團練功，由增生授候選主事，賞戴花翎，後加道銜，旌表孝友。子神寶亦有名。

鄭如蘭的晚年已在日本時代，1899 年獲日本政府佩授紳章，卒於 1911 年。其子鄭拱辰（1860-1923），也於 1908 年佩授紳章，父子同授紳章，可見日本殖民政府對其家族的禮遇。根據《台灣列紳傳》（鷹取田一郎，1916）的記載<sup>1</sup>：

鄭拱辰：「為人重厚溫雅，令譽遠播。乙未〔1895〕鼎革時，出役于保良局，竭力安撫。明治三十一年〔1898〕初登庸辦務署參

<sup>1</sup> 《台灣列紳傳》為總督府歷年佩授紳章者之公式名錄。

事，威望特振。未幾，以家務繁劇故，解綬。四十一年〔1908〕佩授紳章。大正二年〔1913〕六月，更復拜命新竹廳參事。其富百萬，尊前客常滿。簪纓世代，閥閱門第，島中多無出于其右」。

又根據《台灣人士鑑》（台灣新民報調查部，1934）：

鄭肇基（1885-1937），鄭拱辰長男，七歲修漢學，乃本島大漢詩社中之錚錚者，活躍之竹社詩人，其詩採入《臺海擊鉢吟集》。1906年就任台灣米穀株式會社取締役，此後事業及於礦業、製糖、拓殖、海上、火災、金融、帽席、電氣；公職方面，則歷任新竹街助役、新竹州協議會員，為本島產業界、地方自治貢獻不少。另一方面，則補助貧困兒童、學生學費；災害時固不待言，平時即熱心公共事業、社會事業，1925年大正天皇銀婚紀念時，受宮內大臣表彰為善行者。1926年，民國政府佩授二等嘉禾獎章。晚年列名的公私職務名銜有「新竹州協議會員」、「華南銀行監察役」、「台灣蓮草拓殖株式會社社長」、「筆記興業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新竹商工會顧問」等。

從上述可見，鄭家在鄭崇和一代便已經是新竹地區具有家產與社會聲望的大戶人家，1823年鄭用錫高中進士之後，更使新竹鄭家一躍成為具有全島名聲的士紳家庭。新竹鄭家除了鄭崇和一脈之外，其子侄輩也人才輩出，例如同宗不同房的鄭用鑑、鄭用謨等人也都各有學業。根據研究者統計，從嘉慶年間到1895年臺灣割讓之前，鄭家族人擁有科舉功名者共有70人（蔡淵絜，1987：551）。鄭家不但歷年多人擔任教師、倡建新竹城、文廟、編修《淡水廳志》，而且多有著述）<sup>2</sup>。19世紀，台灣之世家大族，一般都舉板橋林家、霧峰林家，但相較於多在產業發展的霧峰林家與多在官場發展的霧峰林家而言，新竹鄭家顯得更有人文氣息，而且積極貢獻社會公益事業，宗族門風也講求讀書孝悌。鄭崇和、

<sup>2</sup> 例如，鄭用錫《北郭園集》、《周易折中衍義》；鄭用鑑《易經圖解易讀》。這些著作未必刊刻行世，著作名稱據連雅堂《台灣通史》（1920）。

鄭用錫、鄭用鑑，都奉准入祀鄉賢祠。1889年劉銘傳題請表揚孝友時，新竹鄭家就有鄭用鈺、鄭如恭、鄭延珪、鄭用謨、鄭如松、鄭如城、鄭秉經、鄭如蘭奉准入祀孝悌祠。由此可見，鄭家的社會地位與社會形象之一般。連雅堂《台灣通史》分別在〈鄉賢列傳〉中採入鄭崇和、鄭用鑑，在〈孝義列傳〉採入鄭用鈺。以一族當中如此多人獲史家肯定者，可謂絕無僅有。

鄭家在新竹地區，甚至全台範圍長期持續累積與維持的社會地位與社會形象，應該會讓鄭家人具有相當的文化與社會自覺，而且成為自矜的門風（日文可以稱為「家柄」）。鄭欽仁教授在他的《訪談錄》（薛化元等，2004）中雖然沒有直接敘述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因為家世背景而來的自我要求，但只要與鄭教授有過接觸的人都不難發現「出身新竹鄭家」這個與生俱來如影隨形的標籤，應該是形成鄭教授人格的重要因素。

另外，因為父親在其出生後不久就逝世，母親鄭林嫦娥（號劍華，又號冰心，法號雪心，新竹法源寺斌宗法師弟子），一方面必須在年輕遽失丈夫之後於整個大家族中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一方面必須在鄭教授的教養上一人同時兼任慈母與嚴父之角色。鄭林嫦娥女士篤信佛教，為新竹近郊法源寺斌宗法師之弟子，秀外慧中，兼有文采，鄭家書香世家之傳統規矩與禮數，幾乎完全一一敬謹遵守，不但對內號令一家大小，而且必須進退有節地代表鄭家與外界禮數往來。從鄭教授的《訪談錄》（薛化元等，2004），可以發現即使對於鄭教授就讀的新竹中學之辛志平校長，或對鄭教授相當器重的東海大學徐復觀教授，母親鄭林嫦娥女士都盡到非常的禮數，表現了傳統書香世家的規矩。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成長於這樣的家庭中之鄭教授，雖然自幼即被尊為鄭家少爺（即使目前仍有新竹宗親朋友稱鄭教授為「欽仁仔舍（欽仁少爺）」），但顯然鄭教授也自幼體認到母親的期待（此或即為傳統所謂「庭訓」），而必須行為端正，不失大家風範，甚至也使他多少有些「少年老成」。

鄭家自從發達以來，不但於公益事業上非常盡力，而且一直有供養

出家人、信佛的傳統。<sup>3</sup> 鄭教授自小即經常必須與家人到新竹近郊法源寺禮佛，其曾祖父和曾祖母也興建一座尼姑庵（淨業院），供養比丘尼，此事一直被鄭家當作一個必須延續的事業。<sup>4</sup> 鄭教授在其《訪談錄》（薛化元等，2004：11）中自謂家庭佛教信仰對其處事待人的影響很大，總有普世救人的慈悲心。

## 貳、台灣人歷史學者

鄭欽仁先生在1955年進入東海大學就讀，1959年畢業，為歷史系第一屆學生。東海大學是中國赤化之後，來台的中國學者向美國基督教團體呼籲延續在中國辦理教會大學傳統而成立的大學。東海大學籌備之初，美國教會方面即宣示：「這所大學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他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對其生活環境應有不斷的自覺，以避免陷入象牙塔，流為士大夫；該大學應落實民主觀念，學生需具備生活思想；課程不須以技術性導向，而應著眼於寬闊格局；避免嚴格的分科，搭配純樸而不矯飾的校舍；以小規模大學型態，學生人數不約五百至六百人。師生全體住校，教職員必須全職，並提供最佳生活條件，且應為基督徒」。董事會所宣示的「私立東海大學設置的目的和方針」，主要內容是：創造一個能自由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秉持有教無類之教育原則，以重質不重量與集體生活為辦學方針；課程教育之外，推行勞作教育以建立「完人」的教育訓練；信仰上自由發展，以培養民主與自由的精神；尊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並擔負溝通中西文化的任務；更重要的是，這一切的教育理想必須能體現落實到台灣社會上，訓

---

<sup>3</sup> 這並不表示鄭家人排斥一般的道教信仰，鄭家對於新竹地區的道教廟宇，例如城隍廟，仍相當重視。

<sup>4</sup> 此淨業院目前還存在。鄭家在新竹都市不斷更新改建的情勢之下，深恐此具有歷史的尼寺將被拆遷改建，曾主動要求政府將之指定為古蹟。

練青年為時代而服務，從台灣發軔，直至世界每一角落」。東海大學在創校之初，的確擁有高度的創造性與實驗性的開創精神（pioneering spirit），其勞作制度、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圖書館開架制度、學生榮譽制度等，在當時都是國內教育史上前所未見的創舉。

東海大學創立初期的校風與教育內容，顯然對鄭欽仁先生有很深的影響，即使到了現在他仍然會談起在東海大學所受的教育（例如，全體住校、勞動服務、重視體育），多麼地具有特色而且有意義；他也會向我們說明東海大學創校初期的教師陣營，多麼地具有特色，《訪談錄》（薛化元等，2004）裡他提到了歷史系的祈樂同教授、<sup>5</sup>藍文徵教授、楊紹震教授、<sup>6</sup>梁嘉彬教授，<sup>7</sup>中文系的徐復觀教授、蕭繼宗教授、孫克寬教授。這些學者在目前以台大、中央研究院為主流的台灣學術系來說，幾乎不見蹤影，但是如果以當時來說則的確當自成一格，只是以後台灣學術發展和學術生態使他們幾乎被遺忘了。在上述這些東海的師長當中，應該以藍文徵教授與徐復觀教授最為重要。<sup>8</sup>

藍文徵教授（1901-76）應該是帶領鄭欽仁先生進入歷史學研究領域的老師。藍教授，字孟博，吉林舒蘭人，早年在家塾、吉林省立師範學校讀書，1925年考入吉林法政專門學校肄業，1926年考入清華學校研究院。畢業後，任教於東北大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逃入關內，任教於青島女中。旋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研究院。1937年歸國後，

---

<sup>5</sup> 出身南京中央大學。

<sup>6</sup> 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曾任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的助教，後赴美留學，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來台後曾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其後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東海大學創校後轉到東海歷史系任教，並在首任系主任劉崇鋐教授歸建台大後接任系主任。

<sup>7</sup> 梁嘉彬（1910-95），廣東十三行天寶行之後人，明代經濟史專家梁方仲之弟，1928年由南開中學考入清華大學史學系，1934年赴日留學，1935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1937年出版成名作《廣東十三行考》，時年僅27歲。來台任教於東海大學時，研究重點轉為《隋書》〈流求國傳〉，晚年則研究中日近代關係史。鄭欽仁先生之台灣史知識啓蒙應該與梁教授有關。

<sup>8</sup> 鄭欽仁先生與徐復觀教授的交往，將在下一節說明。

歷任東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兼訓導主任、北碚國立編譯館編纂。第二次大戰後，參與國民大會制憲工作，任北平行轅參議兼《經世日報》筆政。1948年3月，任國民黨立法委員，兼上海復旦大學、南京中央政治大學教授。1949年12月，來台任教於師範大學，1955年東海大學創校後轉任教授。鄭欽仁先生在東海大學歷史系學習期間，曾經在藍文徵教授指導下撰寫畢業論文《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避地域外考》。這應該是鄭欽仁先生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處女作，這是一篇需要博蒐資料的考證性文章，它為往後鄭欽仁先生的歷史研究方法與方向，奠定了一個朦朧的雛形。

1959年東海大學畢業後，鄭先生曾經在東海大學歷史系擔任一年的助教，1960年考入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同年入學的同學有王家儉、張奕善、賀允宜、劉家駒、王曾才），雖曾一度想要研究台灣史，但因台灣史之圖書難以使用，改而仍然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原來預定編製《北魏會要》，後來縮小範圍研究北魏三省制，最後以《北魏中書省考》、《北魏職品令研究》作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原為勞榦教授，後來因勞教授中途赴美，改由系主任余又蓀教授掛名），在碩士班階段曾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嚴耕望教授之研究助理。鄭先生既以制度史為研究重點，而且在學問上追隨陳寅恪之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之點，強調北朝胡族系統的因素，又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出身之藍文徵教授的學生，因此曾經有人認為若以學統來論，鄭先生應該是陳寅恪在台灣之真正傳人。

如今回過頭來看鄭先生的中國北魏朝代制度史研究，首先不能不讓人驚訝於他當時投入史料之蒐羅、抄錄、排比工作所花費的時間與精力。<sup>9</sup> 那是標點本二十五史還沒有出現、後來被稱為「研究之三種神器之一」的影印機還不普遍，更遑論全文資料庫的時代！鄭先生在博蒐史

<sup>9</sup> 在此，一定要同時強調：在這個工程浩大的史料抄錄工作當中，鄭師母也擔負了重要角色。



料之後，以綿密的史料比對、考訂為基礎，透過綱目體的形式將他所獲得的結論簡要地寫出來。這樣的研究方法與寫作形式，一直是鄭教授歷史學學術研究論文一貫的寫作模式。這種研究方法與寫作形式，設定了相當高的閱讀門檻，對於其研究成果的普遍被理解，其實是不利的。因此，我懷疑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能夠理解鄭教授在北朝制度史與北魏史的高深見解。<sup>10</sup> 不過，只要用心地去閱讀鄭教授這些學術著作，也可以看出他所進行的北魏制度史研究有幾個相當新穎、進步的方法論提示。

鄭教授的制度史研究雖然是建立在史料的「整輯排比」基礎之上，但卻不以此為滿足，他服膺清代偉大歷史家章學誠的名言「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企圖從制度史料的整輯排比、參互搜討的工作中發現更重大的歷史問題。所以他自己說其所謂的制度史，並不只是政治制度史，同時也是政治史、社會史。<sup>11</sup> 因此，在幾篇討論官制問題的文章當中，都同時討論了它們與北魏政治上重要政治事件的關係。<sup>12</sup> 最近史學界多稱要研究「活的制度史」，其實早在 30 餘年前，鄭教授所做的就已經是活的制度史研究了。

鄭教授的制度史研究同時也是社會史研究，這在「譯人與官僚機構——北魏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前提之一」一文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鄭欽仁，1976）。鄭教授承陳寅恪、繆鉞等前輩研究者之後，注意到龐大的王朝帝國統治由於統治不同的種族、地域，因此帝國內部必然存在著語言問題、統治機構的圓滑運作問題，所以他能夠深具慧眼地看出北魏有《國

<sup>10</sup> 目前，可以比較綜合性地理解鄭教授關於中世中國史之看法的，是他與自己指導的幾位學生 1998 年一起編寫的《魏晉南北朝史》。其中，鄭教授執筆的是第一章「導論」與第二章「漢王朝的崩潰」。另外，當初以一般歷史系學生為對象所寫的幾篇概論性的文章：「帝國遺規兩千年——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色」、「鄉舉里選——漢的選舉制度」、「九品官人法——六朝的選舉制度」，俱收入鄭欽仁（1982）主編的《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立國的宏規》，至今都還是歷史系學生的必讀文章。

<sup>11</sup> 見鄭欽仁 1995 年所著《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續編》之序言。

<sup>12</sup> 例如，〈北魏中侍中稿——兼論劉騰事件〉、〈北魏中常侍稿——兼論宗愛事件〉、〈北魏中給事（中）稿——兼論北魏中葉文明太后的時代〉，俱收入前揭《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續編》。

語孝經》、《鮮卑語》、《國語真歌》、《國語號令》、《鮮卑號令》等胡族著作，而進一步探索北魏政權的多元統治性格和其政治運作中的族群關係。這樣的研究得以脫離向來以漢族中心主義的漢化論解讀歷史的侷限，進而承認中國周邊民族在歷史舞台上的平等地位。由於放棄單調片面的漢化論，鄭教授改而企圖從民族學求取知識資源，來彌補傳統歷史解釋的不足，所以他大量閱讀了日本生態學者今西錦司、民族學者梅倬忠夫的著作，甚至也對游牧民族的重要性畜馬做過研究（鄭欽仁，1976）。但我認為他以民族學知識企圖突破自己之北魏歷史研究的努力，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成果（不過，它顯示了當時他受到 1960 年代美國歷史學界提倡的素樸之「輔助學科」觀念的影響），其實他的問題一樣可以用政治力學這種政治史經常使用的傳統手法來解釋，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之研究》就是一個好例子（後來，鄭教授曾在課堂上領導學生們讀這部名著）。

當不能滿足於以漢族中心主義的漢化論來解讀中國歷史上的「胡族國家」時，「征服王朝」這樣的解讀方式就自然進入鄭教授的視野了。鄭教授比較有系統地吸收「征服王朝」之看法，應該是在 1975 年前後。最先他是利用暑假期間特別為我與于志嘉逐句地口譯村上正二教授的論文「征服王朝」，後來則成為他正式課堂上的必讀文獻。<sup>13</sup>「征服王朝論」認為中國北方被中文文獻稱之為「胡」、「虜」的民族，在勢力較大進入中原地區建立王朝後，仍然意識性地保存自己的文化、制度，而在其統治領域內形成「二（多）元體制」。這種看法最先出於美國漢學家賴德懋（Owen Lattimore），以後則被日本的北亞學者所深化，晚近美國學術界中成為熱門話題的「新清史」（認為清朝體制有具有執拗的滿州性質），也是可以說是這種「征服王朝論」的發展。

作為一個歷史系的教師，鄭教授從日本留學歸國後的第二學年

<sup>13</sup> 後來這些當時用來讓學生閱讀的文章，彙整出版為《征服王朝論文集》（鄭欽仁、李明仁，1999年）。

(1974年8月起)即擔任歷史系一年級必修課程「台灣通史」。也就是說,1974年入學的台大歷史系學生都必修鄭教授的中國歷史課程(我本人就是當年進入台大的,雖然不是歷史系的學生,但是一年級必修的「中國通史」也是鄭教授擔任授課教師,因此上課內容與歷史系一年級大致相同)。記得鄭教授授課時所開列的參考書單有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和柳詒徵、呂思勉、繆鳳林的書,但是對於當時相當著名的錢穆《國史大綱》,卻不甚強調著墨不多。如今回憶起來,鄭教授對於中國上古史的講授相當詳細,印象比較深刻的上課內容是:半坡文化與河姆渡文化;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顧頡剛層壘締造的古史說;傅斯年的大東小東說·夷夏東西說;日本學者的邑制國家說;皇帝制度的成立與個人人身支配。當時一般的中國通史講授內容大都不出概說的範圍,甚至還不免具有政治課程的性質,但是鄭教授的授課不但納入日本的研究成果,而且將中國對於中國古代史的重大發現也當成授課內容。<sup>14</sup>因此,鄭教授的「中國通史」雖然其授課內容集中於中國古代史(大概在六朝以前),但是卻與當時歷史系的其他課程相當不同,既提供了學問的視野和深度,也將那些具政治臭味的課程反照了出來,對於有志於追求知識的大學生來說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因此,鄭教授的課堂上當時聚集了台大歷史系的好學學生。自1974年以後的大約15年間,鄭教授可以說是台大歷史系的「台柱教授」,尤其他在這一段期間培養出了一批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歷史研究學者,如今都已經是台灣歷史學界該當領域的中堅學者(鄭教授指導的學生名單及其研究主題,見附錄)。這些學生都相當尊敬鄭教授的學問與人格,因此在其榮退與70壽誕時,均主動撰寫論文,編輯出版的學術研究論文集祝賀(論文集收錄的論文篇目及執筆者名單,見附錄)。

<sup>14</sup> 鄭教授在日本留學期間非常有系統地訂購了《考古》、《文物》等專門登載中國古代史考古發現和研究的雜誌。台灣學術界以1949年之後的中國考古成果重新撰寫中國古代史的,應該是蕭璠(1979)所著的《先秦史》。

有人說：研究中國文史之學者，就是「中國教」的傳教士。從近代以民族主義為基底的百年來學術傳統來看，事實的確如此，此話自有它的道理。即使目前學術研究已經逐漸脫離「士大夫之學問」的性質，而漸漸成爲一種專業技術的現在，絕大部分的中國文史研究學者其實還是難以脫離爲傳統中國「傳教」的窠臼。但是，很奇怪的，鄭教授似乎不適用上述的評語。例如，中國文明誕生於中原地區的「一元發生說」，即使現在都還是教科書的主流記載，但1974年鄭教授卻已經在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課堂上教我們：中國文明至少有黃河與長江的兩個誕生源頭。當1970年代，強調讀中國歷史必須抱持著溫情與敬意的錢穆《國史大綱》大行其道的時候，鄭教授推薦給我們的中國通史閱讀參考書竟然是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當年保守知識份子普遍認爲嘻皮運動、學生反亂已經宣告西洋文明正在沒落，而中華文化正是挽救世界前途的良方，但鄭教授對於學生如下的發問：「錢穆說：西方文明是物質的，中國文明是精神的。你認爲是嗎？」竟然不假思索簡單明瞭地回了一句話：「那麼，貝多芬的交響樂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不亦快哉！這種將中國歷史、文化澈底地對象化，以與「溫情與敬意」對極的「冷靜與理性」毫不容赦地進行研究課題的分析解讀，表現了鄭教授作爲一個真正中國歷史研究者的深度。

### 叁、歷史學者的政治參與

雖然鄭教授在他的訪談錄中，自謂：

我自己不停的在思考，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我有這種社會參與的興趣和機會？目前暫時的結論，大概是因為從初中到高中的一些經歷的影響。在閱讀經歷方面，我在初、高中的寒暑假期間，涉獵相當廣泛的書籍。……當時讀的書很雜，比如說《俾斯麥傳》或者兵法之類的書，也都看過，讀了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影響我知道要關心國是。此外，家庭佛教信仰的影響也很大，普世救人的慈悲心常會油然而生（薛化元等人，2004：10-11）。

但是，我卻想要強調，鄭教授在每一個生涯階段的邂逅與機會，才是造成他之政治介入的重要因素。

鄭教授小時候雖然應該是個被相當保護的世家少爺，但據他自己說是卻也練過武，而且那些陪他渡過青少年時代的人當中，也有一些具有豐富閱歷的「奇人能士」，這些人大概也想應該讓這個小少爺有一些鍛鍊吧。因此，鄭教授在青少年時代已經多少少年老成地知道一些江湖中的事了。

東海大學的階段應該是形塑鄭教授政治、社會態度的重要時期。東海大學創校當初的美式自由主義學風、「全寮制」與生活自主管理、重視體育及運動家精神，都是鄭教授之青春成長期的重要人格培養資源。鄭教授即使到現在都還津津樂道他的東海大學生活，尤其是宿舍裡的同學情誼和體育活動（據說他是足球隊和棒球隊的主力）。更重要的是，他在東海大學時與徐復觀教授的過從，應該對他的政治介入與態度有決定性的影響。

徐復觀教授（1904-82），曾經擔任蔣介石秘書，以急言直諫不容於當道，乃於 1949 年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以傳統主義論道，以自由主義論政」，東海大學成立後來台為中文系教授，在東海大學教書期

間與台灣仕紳讀書人（例如，台中的莊垂勝、葉榮鐘等），頗有交往。鄭欽仁先生在大學一年級時的國文教師就是徐復觀教授。當時，徐復觀教授被視為既可論道又可論政的熱血學人，他不但在全國的言論界具有高知名度（曾與李敖等人論戰），在東海大學內也聚集了一批青年學生，鄭教授就是其中之一。鄭教授于東海大學畢業時，母親鄭劍華女士曾邀徐教授遊覽新竹並安排新竹中學辛志平校長作陪為謝師之宴（薛化元等人，2004：19），顯示鄭教授一家與徐復觀教授的關係非比尋常，甚至有通家之誼。<sup>15</sup>

徐復觀先生對於鄭教授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幾件事看出來：當年圍繞在徐復觀先生身邊的東海大學年輕人，後來成為持續具有聯繫的一個網絡（這個網絡與鄭先生比較有聯繫的是蕭欣義、樂炳南、陳文華、王孝廉……，甚至年紀較小的江春男）。1980年代，鄭教授與江春男等人已經積極參與「黨外」運動時，徐復觀也透過鄭教授和江春男等學生在台灣盡了一些力。另外，1970年代中期鄭教授在台大歷史系授課時，相對於同被稱為「新儒家」的錢穆、牟宗三，鄭教授總是推薦學生閱讀徐復觀的著作，尤其是對於中國獨裁政治有比較操切批判的《兩漢思想史》。

1960年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就讀之後，鄭教授顯然並不是能融入新環境，他不能習慣原本就是台大出身的同學為學鬆垮卻又喜歡相互標榜、競趨奉承老教授、自奉為正統的習氣（薛化元等人，2004：22-23）。當時比較能夠讓他覺得有趣的，可能是那些被台大學閥系統看不上眼的支流旁系（例如，台灣史、日本史、東南亞史的研究者）或類似孟絕子、蔡懋棠這類的「異端者」吧。

不過，這時候鄭教授似乎還未明顯地介入政治。他真正積極地關懷政治，還是1969年8月以哈燕社獎學金赴日進修之後的事。鄭教授之赴日進修手續，獲得原來台大歷史研究所學長張國興之幫助（張國興甚

---

<sup>15</sup> 訪談錄中特有一節記徐復觀先生。

至於其赴日之初擔任「在留保證人」。鄭教授在台大讀書時期與張國興之熟識程度如何，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留日時期，張國興應該對鄭教授的政治參與和以後的政治行動，有非常大的影響。張國興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時代，頗受陳紹馨教授之賞識，原有意從事台灣人口史之研究，<sup>16</sup>但因不受當時台大文學院長沈剛伯之支持，而不待完成碩士班學業就出國去了，甚至在抵達日本的隔日就加入日本的台獨聯盟。鄭教授留日期間與張國興過從甚密，想必應該受到相當影響。不過，鄭教授在其訪談錄中說他留日期間，與其他的台獨聯盟成員並未熟識。例如，黃昭堂先生並未謀面，與許世楷先生也只見過一面而已。

從年表來看，鄭教授留學日本之後在很短的期間內出現了一連串「異乎尋常」的表現。一向只發表堅實之北魏制度史考證學術論文的鄭教授，於 1970 年 1 月在《反攻月刊》翻譯發表了日本左派學者西英禮（1970）批判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殖民地的傷痕——帝國主義的台灣觀〉；1971 年 5 月，與鄭教授熟識的日本人小林正成來台散發暴露國民黨反攻大陸主張之虛構性的傳單，呼籲台灣人覺醒，主張台灣獨立而被國民黨逮捕的「小林正成事件」；1972 年 2 月，鄭教授參與了謝聰敏救援事件；1972 年 4 月，翻譯發表日本左派學者山邊健太郎（1972）的論文〈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與朝鮮之比較〉；1972 年 5 月，翻譯京都大學左派歷史學者（人民革命派）井上清教授關於釣魚台歸屬問題的文章「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的歷史與歸屬問題」，刊載於香港《明報月刊》。

如果從單純的意識型態來看，上述的幾件事不無內在邏輯上的矛盾。但是我們如果將鄭教授留日期間，國際上的時局動向與台灣的國際情勢一起觀察，就不會覺得突兀了。

在日本國內的動向來說，鄭教授赴日留學的 1968 年，是全世界的大學生幾乎都起而「作亂」的年代（當然，台灣是例外）。該年 5 月法

<sup>16</sup> 據說，陳紹馨教授撰寫《台灣省通志稿》「人口篇」（1958）時，張國興參與不少。

國的「五月風暴」不但癱瘓了法國政治，也迅速影響全球，日本的學生運動也風起雲湧，東京大學的安田講堂也在該年7月被學生佔領，直到1969年1月才在大學請求警察機動隊介入之後將佔領學生趕出，東大也隨即宣布該年的入學考試停辦。1970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更新延長，日本學生運動與左派政黨也發動大規模的反對運動（七十年「安保鬥爭」）。

從台灣的國際情勢來看，1971年4月，中共與美國透過「乒乓外交」展開交流；該年7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密訪中國；該年10月，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11月，因為美國將在結束沖繩託管而把沖繩之治權交回給日本的同時，也將釣魚台群島交給日本，引起在美國的留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式訪問中國，發表『中美聯合公報』（『上海公報』）；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宣佈中日建交。

也就是說，鄭教授赴日留學期間正好是日本戰後第二波左翼運動的高潮，更重要的是，此時也是台灣之國際處境最為動盪的危機時期。鄭教授曾經不止一次地談到聯合國表決中國會籍議案時，透過日本電視畫面看到非洲國家代表高興地跳上會議桌的情景。原來在台灣島內，國民黨政權一直封鎖國際上的不利消息，因此在國際外交上的這一幕對於台灣留學生來說，顯然是太震撼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美、日積極地與中共接近，尤其是日本快速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使得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更有切身的危機感，此時的中華民國似有「危在旦夕」之況。而且，鄭教授也在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的前後，見識到了中華民國外交官的無能。《訪談錄》（薛化元等人，2004）中對於當時中華民國外交官無法積極保護在日財產有很詳細的敘述。

從以後的發展來看，留日期間碰到的台灣國際地位的危機，決定了鄭教授以後政治介入的主要關注重點，在於台灣之國際地位和國際政治對台灣的影響。尤其當時國際的基本架構是戰後的冷戰體制，美日兩國



爲了與中國接觸而展開一連串的秘密和非正式外交。這種不透明的外交，顯然令像鄭教授這樣的台灣留學生對自己個人與國家的處境更充滿了焦急、疑慮與不安。鄭教授似乎在此時就經常透過報刊上的一些蛛絲馬跡，企圖瞭解揣摩國際間的動向和台灣的處境。

鄭教授於 1973 年 3 月回國，繼續任教台大歷史系。1974 年 8 月起的學年，開始擔任歷史系的大一必修課目「中國通史」，進入他在台灣歷史學界最有貢獻的年代（已如上述）。

回國後的鄭教授在教學、研究之外，他還參與了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在鄭教授回國後參與的民主化運動過程中，與康寧祥、陳永興、李永熾之間的結識和合作，最值得注意。上述幾個人，應該是鄭教授在參與民主運動的路上最具有重要意義的人物。鄭教授回國後即積極於聚集知識界的有志之士，尤其是曾經有留學日本經驗的學者。但是，他與康寧祥結識應該具有突破性的關鍵意義。

鄭教授與當時被視爲黨外新銳的康寧祥認識，應該不晚於 1974 年。<sup>17</sup>此時，康寧祥似乎有一批經常來往的學者（例如，經濟學者林鐘雄教授應該就是相當重要的一位），鄭教授應該是其中的一位，但是鄭教授參與當時康寧祥的黨外活動多深，則不得而知，不過至少在 1975 年 8 月《台灣政論》出刊之前，他已經事先知道此事。此後，鄭教授的黨外運動參與，一直與康寧祥有密切的關係。1978 年底，立法委員選舉，但該次選舉活動中途因爲美國宣布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康寧祥聞訊之後呼籲停止選舉共同面對國家危局。因爲康寧祥在選舉期間已經號召不少學者與知識人協助選舉，鄭教授主張應該創造一個平台，讓這些已經聚合在一起的有志者得以繼續發揮力量，於是建議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雜誌。<sup>18</sup> 1988 年，康寧祥集資成立「財團法人現代學術

<sup>17</sup> 鄭教授與康寧祥先生認識之後，經過康寧祥先生的介紹認識王詩琅先生，1975 年鄭先生知道我對台灣史有興趣，特地帶我去拜訪王詩琅先生，從此我經常在王先生家出入，並幫忙《台灣風物》雜誌的編輯和雜務。

<sup>18</sup> 《八十年代》於 1979 年 6 月創刊，由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也是徐復觀教授的學

基金會」，鄭教授擔任基金會董事長。1989年，康寧祥創辦《首都早報》，鄭教授擔任該報總主筆。1990年6月，鄭教授以《首都早報》總主筆出席李登輝總統就任之後的「國是會議」，提供了不少灣民主化的建言。

鄭教授應該是在康寧祥的幕僚團當中，與陳永興先生相識的。當時的陳永興先生不但是一個具有熱誠理想，又有實踐力的壯年人，而且對於台灣歷史，尤其是日本時代的醫生前輩之社會奉獻事蹟相當重視，並以繼承這種精神自許。陳永興在1984年與李勝雄律師等人創立「台灣人權促進會」，鄭教授就一直是陳永興先生的同志。1987年10月起，擔任2年副會長，並於1990年10月起擔任會長。

李永熾教授則是鄭教授在台大歷史系碩士班時期的前後期同學，後來雙雙進入台大歷史系任教成為同事，並且先後赴日留學進修。與鄭教授回國後即積極參與民主化的實際行動相對照，李永熾教授從日本進修回國後的初期，其精力幾乎都用於譯介國外之思想與文學，其翻譯出版之數量幾達百種，成果斐然。但就如前述，鄭教授回國後積極聚集具有留日經驗之學者，李永熾教授當然就在其「動員」之範圍裡。1985年，「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成立，鄭欽仁教授與李永熾教授負責其文化、教育部門，應該是他們兩人聯手的開始。此後，不論是「財團法人現代學術基金會」或是《首都早報》，都可以看到兩人攜手合作共鬥的形影。長期被國民黨監禁的施明德出獄之後，於1992年成立「台灣重建委員會」，李永熾教授積極參與，鄭教授也一起投入。

## 附 錄

### 鄭欽仁教授略年譜

- 1936.04 生於新竹
- 1955.09-1959.06 東海大學歷史系（第一屆）。
- 1959.08-1960.07 東海大學歷史系助教。
- 1960.09-1964.07 台大歷史研究所（指導教授：勞榦、夏德儀、余又蓀）。
- 1964.08-1965.07 服兵役。
- 1965.02 出版《北魏中書省考》（台大文史叢刊 No. 14）。
- 1965.08 獲聘為台大歷史系講師。
- 1967.08 台大歷史系同事李永熾留學日本（-1970.07）。
- 1968.07 日本大規模學生運動，東大學生佔領安田講堂。
- 1968.09 赴日留學，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生。
- 1969.01 翻譯發表〈漢代的尚書〉（《大陸雜誌》第 38 卷第 1 期）。
- 1969.04 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成為正式的院生。
- 1969.04 翻譯發表〈匈奴——古代游牧帝國的形成〉（《新時代》第 9 卷第 4 期）。
- 1969.09 發表〈書評：山本隆義《中國政治制度之研究——內閣的起源與發展》〉（《東洋學報》第 42 卷第 2 期）。
- 1970.01 翻譯發表西英禮〈殖民地的傷痕——帝國主義的臺灣觀〉（《反攻月刊》第 334 期）。
- 1971.02 發表〈北魏秘書省考〉（《大陸雜誌》第 42 卷第 2 期）。
- 1971.04 中美以〈乒乓外交〉進行交流。
- 1971.05 小林正成事件。
- 1971.07 季辛吉密訪中國。
- 1971.08 翻譯發表〈從近現代史的立場檢討東亞的歷史像〉（《亞洲研究譯叢》第 3.4 期合刊）。
- 1971.10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 1971.11 美國紐約留學生發起保釣運動，迅速蔓延各地留學生。
- 1972.02 參與救援謝聰敏工作，與彭明敏通信。
- 1972.02 美國總統尼克森正式訪問中國，中美發表『中美聯合公報』（『上海公報』）。
- 1972.04 翻譯發表山邊健太郎〈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

- 的臺灣與朝鮮之比較)(《食貨月刊》第2卷第1期)。
- 1972.05 翻譯發表〈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的歷史與歸屬問題〉(《明報月刊》第77期)。
- 1972.09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中日宣布建交。
- 1972.09 發表〈北魏中侍中稿——論劉騰事件〉(《食貨月刊》第2卷第6期)。
- 1972.12 發表〈北魏中常侍稿——兼論宗愛事件〉(《食貨月刊》第2卷第9期)。
- 1973.03 回國繼續任教台大歷史系。
- 1973.04 發表〈北魏中給事(中)稿——兼論北魏中葉文明太后時代〉(《食貨月刊》第3卷第1期)。
- 1973.08 升任副教授。
- 1974.02 獲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
- 1974.08 自此學年開始擔任歷史系一年級必修科目〈中國通史〉課程。
- 1975.06 發表〈北魏中散官考〉(《台大歷史學報》第2期)。
- 1975.08 《台灣政論》創刊。
- 1975.10 在《台灣政論》撰文介紹國際特赦組織(AI)。
- 1976.02 出版《北魏官僚機構研究》(台北：牧童出版社)。
- 1976.05 發表〈譯人與官僚機構——北魏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前提之一〉(《台大歷史學報》第3期)。
- 1976.08 升任教授。
- 1979.06 《八十年代》雜誌創刊。
- 1982.06 康寧祥、尤清、張德銘、黃煌雄等黨外4人赴美訪問。
- 1983.11 在康寧祥競選立委文宣撰寫〈禁止自決，拋棄王牌！〉(筆名陸淵)。
- 1984.10 〈台灣人權促進會〉成立。
1985.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成立。
- 1987.02 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 1987.10 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1988)，1990擔任會長。
- 1988.06 擔任〈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1994.06)。
- 1989.06 《首都早報》創刊(-1990.08.27停刊)，擔任總主筆。
- 1990.06 國是會議。
- 1992.05 施明德成立〈新台灣重建委員會〉，鄭教授與李永熾教授參與。
- 1992.10 擔任《台灣評論》雜誌社社長。
- 1992.12 擔任〈新台灣助選團〉副總召集人(召集人：高俊明。副總召集人：鄭欽仁、李永熾。榮譽顧問：李鎮源)。

## 鄭欽仁教授指導之博士、碩士論文

- 1985 碩士論文 耿立群《蜀漢對西南的統治與開發》
- 1985 碩士論文 吳慧蓮《東晉劉宋時期之北府》
- 1985 碩士論文 張繼昊《北魏變亂問題初探》
- 1985 碩士論文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初探》
- 1985 碩士論文 蔡幸娟《南北朝降人研究（西元 398-534）》
- 1986 碩士論文 李明仁《前燕政權性格與結構之變遷》
- 1989 碩士論文 金榮煥《北魏與東北諸國關係研究（以庫莫奚、契丹、高句麗、勿吉為中心）》
- 1990 博士論文 吳慧蓮《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
- 1991 碩士論文 張幸真《北魏南進政策下的遷都》
- 1992 博士論文 張繼昊《北系部落民與北魏政權研究》
- 1992 博士論文 呂春盛《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以權力結構演變為中心之考察》
- 1994 碩士論文 黎幼蓮《東晉南朝的貴族、豪族與道教》
- 1995 碩士論文 黃麗如《漢隋之間滎陽鄭氏研究》
- 1995 博士論文 金榮煥《拓跋鮮卑早期歷史研究：以《魏書》〈序紀〉之分析為中心》
- 1997 博士論文 蔡幸娟《北朝女主政治與內廷職官制度研究》
- 2000 博士論文 李明仁《北朝、隋及唐朝前期繼承制之研究》

## 《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99 年）

- 金榮煥〈後漢末曹魏初鮮卑族的盛衰研究——以檀石槐、軻比能為中心〉
- 林富士〈傳統中國社會對於《老年》門檻的界定——以漢唐之間的文獻為主的初步探討〉
- 劉淑芬〈中古的宦官與佛教〉
- 張寅成〈南朝皇帝喪禮的重建——從百濟王室祭祀遺址談起〉
- 蔡幸娟〈北朝宦官研究〉
- 張繼昊〈由氏至家——婚姻關係與拓拔鬱律一系的崛起〉
- 吳慧蓮〈魏宋之間的和戰關係〉
- 呂春盛〈從外在形勢的演變論陳宣帝的北伐〉
- 陳弱水〈論中唐古文運動的——個社會文化背景〉

薛化元〈札合木在鐵木真統一蒙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安答與爭雄對手〉

王汎森〈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的《急救心火》為例〉

周婉窈〈明清文獻中《臺灣非明版圖》例證〉

于志嘉〈清代江西衛所的沿革與人口分佈〉

吳密察〈乙未之役的劉永福〉

蔡志祥〈修譜——宗族的統合與分支：以香山徐氏族譜為例〉

劉季倫〈《人國》——魯迅的《理想之邦》〉

李福鐘〈整治通貨膨脹與中共政權的建立（1949-1950）〉

李明仁〈敵天大帝信仰初探〉

丘為君〈啓蒙、理性，與現代性——啓蒙運動的歷史反思〉

《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縣：稻鄉出版社，2006年）

王汎森〈歷史與社會——近代中國史學的四次變化〉

劉靜貞〈歷史記述與歷史論述——前後漢書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

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

劉淑芬〈六朝健康的佛寺與城市空間〉

蔡幸娟〈東晉褚太后女主政治發展與桓溫〉

宋德熹〈中古時期長孫氏家族盛衰及其政治動向〉

張繼昊〈北魏孝文帝的帝國理想〉

于志嘉〈再論塚集與抽籍〉

李明仁〈嘉義雙忠信仰與族群之開發〉

## 參考文獻

- 山邊健太郎（鄭欽仁譯），1972。〈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與朝鮮之比較〉《食貨月刊》2卷1期，頁30-56。
- 井上清，1972。〈釣魚列島（尖閣列島等）的歷史與歸屬問題〉《明報月刊》77期。
- 台灣新民報調查部（編），1934。《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
- 西英禮，1970。〈殖民地的傷痕——帝國主義的臺灣觀〉《反攻月刊》334期。
- 張炎憲，1986。〈台灣新竹鄭氏家族的發展〉收於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頁199-217。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張蔭麟，1971。《中國上古史綱》。台北：華岡出版。
- 連雅堂，1920。《台灣通史》。台北：台灣通史社出版。
- 陳紹馨，1958。〈人口篇〉《台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蔡淵潔，1987。〈清代台灣的望族——新竹北郭園鄭家〉收於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第三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頁551。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 鄭欽仁（編），1982。《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立國的宏規》。台北：聯經出版社。
- 鄭欽仁，1976。〈譯人與官僚機構——北魏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前提之一〉《歷史學報》3卷，頁85-99。
- 鄭欽仁，1978。〈亞洲馬的分佈〉《漢聲》2期。
- 鄭欽仁，1995。《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續編》。台北：稻禾出版社。
- 鄭欽仁、吳慧蓮、呂春盛、張繼昊（編），1998。《魏晉南北朝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 鄭欽仁、李明仁（編），1999。《征服王朝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 蕭璠，1979。《先秦史》。台北：長橋出版社。
- 錢穆，1974。《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薛化元、潘光哲、劉季倫，2004。《鄭欽仁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
- 鷹取田一郎（編），1916。《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

## Professor Chin-jen Cheng's Life

Mi-cha W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 Abstract

Professor Chin-jen Cheng was a specialist on Wei-Ching North and South Dynasty history in his early career. He became concerned with Taiwan's histo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le studying in Japan. Under Kuo-Hsing Chang influence, Professor Cheng was involved with Taiwan Independence Union in Japan. His enthusiasm for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long lasted after coming back to Taiwan. He joined Ning-shiang Kang in numerous political reform movements. Along the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fessor Cheng was a very well recognized activist and scholar.

**Keywords:** Chin-jen Cheng, Taiwan Independence Union in Japan,  
The 80s Magazine, Capital Post